

# 双塔



## 评论的「紧缺」和「过剩」

赵宪臣

“紧缺”和“过剩”看似一对矛盾的存在，却在当下文学评论场域中是看得摸得着的现实。先说紧缺。当下的文学创作风生水起，需要评论也必须跟上节奏，也要有一个评论的风生水起，但现实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从创作数量上来看，各种纸质文学报刊推出了大量的作品，呈现出“洞庭波涌连天雪”之势。仅就长篇小说而言，每年的出版数量就构成了对读者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但这些长篇小说被关注评论外，大部分作品都悄无声息地淹没，并没有获得一部长篇应有的被言说待遇。这就是一种文学评论紧缺的表现。对名家作品的无原则膜拜，凡作品都是名家的，在一些评论家的心里已根深蒂固。所以当一些名家的新作一旦推出，就会迅速有评论家出面摇旗呐喊。所谓的评论紧缺，在名家那里是体现不出来的。能体现出紧缺的是那些写出了不俗作品，但名声不显甚至寂寂无名的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即使写出了新意，写出了与众不同，但处于没有评论家关注的状态，作品的价值得不到及时发掘。这样的紧缺是不平衡、不均等的紧缺，是评论的怪现象之一。

正是出于对这种紧缺的警醒，一段时期以来，大力加强和发展文学评论的呼声不绝于耳，关于文学评论的热议也日渐增多，文学评论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可，人们写作文学评论的热情也开始调动起来。但紧接着这种对文学评论的倡导，评论的过剩问题也相应产生。这种过剩就是，许多作家创作评论是写出来了，但发表成了难题，造成了过剩和积压。这里所说的发表是在正规的报纸期刊露面，不是指网络自媒体。因为就文学写作而言，能得到最大认可的发表途径还是传统的、有权威性的纸质媒体。只有在一些颇有影响力的重要的纸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彰显。但是，当下批评的现状是，专业的文学评论杂志少，很多文学报刊发表文学评论也很有限，有的根本没有评论的一席之地，造成了供大于需。

一方面是大力倡导加强文学评论工作，一方面却是大量的文学评论积压在报刊的投稿邮箱里发不出来，评论的过剩显而易见。当然，就邮箱里的评论投稿来说，肯定有不少还没达到发表的水准，但肯定也有达到了发表水准，甚至有一定见地的评论在等待被发现。有些可能已被发现，却因为版面紧张得不到安排，这时候的评论过剩在投稿与发稿之间就已凸显。

文学评论发表难，这是大部分评论写作者都有的切身体会。但是，不发发表是报刊编辑的事儿，写不写是评论者个人的事儿。他们时刻关注着评论的发展动向，对报刊上频频亮相的名家评论也多有阅读，但阅读后却发现，很多名家评论并不能让评论家满意，从中也读不出见解有多么深刻。有些名家评论可以称之为“惯性评论”。所谓惯性评论，就是评论家在长期的评论写作中所形成的个人套路及思维方式。这种套路和思维方式已经固化在评论家的意识之中，只要一涉笔评论就会顽强地冒头。这样的评论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但读多了肯定有“至今已觉不新鲜”的感觉。

解决评论的“紧缺”和“过剩”这对矛盾，有必要从担当发表重任的报刊编辑入手，具体说来就是应该对文学评论以质量优劣定取舍，不能以评论家的名声大小来看取，要对一些名家的“惯性评论”保持警惕。在名家的惯性评论与无名者的有见地评论之间，应舍名家而取后者，毕竟文学评论比试的是看谁写出了真知灼见。对名评论家更要高标准严要求，最起码名家的评论要超越一般评论，而不是在惯性轨道一路滑行。

文学评论关注名家作品，尤其是名家的新作品，本身也是评论常态，并不是说为名家作品写评论就该一律否定。在文学创作中，成熟优秀、已有定评的作家更有可能写出值得评论的作品，文学评论热衷于解读评价名家作品，更有助于研判文学态势，也有益于文学创作质量的提升。但文学评论关注名家作品，不能以评论家的批量化制评论，而是以真正读出了作品真义作为写评论的立足点。评论出作品深邃的内蕴，达到直击人心的效果，才是评论家评论名家作品的正途。那些老生常谈、依赖惯性不走心的评论还是少写为妙。

我对目前的文学评论刊物过度强调学术规范的做法也存有个人疑虑。引用和注释在文学研究中，起到了“每一种说法都有出处”的作用，是一种学术上的严谨要求，本应予以肯定，但在一些评论刊物那里，一篇文章里有没有引用和注释，成了刊物定取舍的一项指标，没有引用和注释的文章就会被拒之门外。这直接导致了一些研究论文为引用而引用、为注释而注释的倾向，无形中助长了文学研究中的“掉书袋”、卖弄学问的风气。

文学研究和一般评论之间本来就有很多差异，学术上有关引用和注释的硬性要求，更是增大了这种差异，让研究和评论成了两辆在道上越跑越开车的车。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不断走向融合，才有利于促进文学评论的繁荣发展。

现在各方面都在注重构建新发展格局。文学评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解决评论的“紧缺”和“过剩”问题。只有充分激活评论者的创造力，一个活跃的文学评论新局面才会令人充满期待。

## 关注“新时代文学晋旅”丛书①

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1月12日，“文学照进创想·新时代文学晋旅系列读书活动”在山西智创城2号路过书店举行。活动由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省转型综改示范区主办，路过文化公司承办，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省当代文学基金会、太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杨遥、手指、蒲歌、杨凤喜、陈克海、陈年6位山西中青年作家分别与读者分享“新时代文学晋旅”丛书《隐疾》《小县城》《迂回的隐痛》《沙发》《烈日下》《暮年辞》。今日起，本版推出“关注‘新时代文学晋旅’丛书”系列文章，展现山西文学新气象。首期聚焦作家杨遥及其的小说集《隐疾》。——编者

# 我睁开眼睛之后

杨遥

写小说越来越慢，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写得尤其慢。第一次有了点萌芽，是几年前下班后，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收音机坏了，让我给他买一台。此前，父亲从来没有麻烦过我。那一刻，我意识到父亲老了，同时意识到这是小说的好开头，但接下来写什么，完全没概念。

2017年，山西省委组织部安排万名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我到晋南山区乡镇挂职任副乡长。2007年我在家乡代县的乡镇任过实职，时隔10年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感觉有些不寻常。

在此之前，我自认对农村工作非常熟悉。10年前的任职不说，大学刚毕业最早在乡镇教育办公室，参与过许多乡镇工作，又当过数年乡村教师，我的家人与众多亲戚、同学都是农民。我经常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每年回几次老家，整天和他们在一起。没想到这次挂职，发现晋南的农村和我老家晋北的农村不一样，以前想当然地认为最起码山西的农村都差不多，然后发现乡镇的中心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年前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乡镇里主要是收摊派，“三提留”“五统筹”，再加上做计划生育工作。10年前在乡镇任职那会儿，因为所在乡镇是县城的城关镇，主要任务是处理信访问题。这次来到农村，农业税早已废除，生二胎从超生罚款变成了鼓励支持，主要工作成为脱贫攻坚，而脱贫攻坚也和以前做法不一样，我开始怀疑以前的自信。

2018年，山西组织作家书写关于全省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我与另外两位朋友接到了任务。几个月时间，走访了全省20多个贫困县，采访了上百位贫困户、驻村干部、各类帮扶责任人，在吕梁山腹地、太行山山麓，见到一位位贫困的农民因为这次脱贫攻坚，过上了他们意想不到的生活。我意识到时代发生了巨变，而此前根本不知道，不光我这样，经常联系的一些朋友，比较熟悉的一些微信朋友圈，对于扶贫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一些新闻报道和道听途说。于是觉得记录这件事情，成为很重要的责任。

记忆最深的是有几件事，其中在革命老区武乡县，采访做微商的人，他们居然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

人，其中最大的一位已经70多岁。我们开始采访的时候，这些农民面对我们，用他们的手机直播我们的采访过程。这还是我们印象中的农民吗？中间了解到一些非常生动的细节，比如让孩子买上手机学习拼音，把小米卖到非洲多哥，我觉得以前想的小说可以写了。

在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中，读初中的女儿经常让我看她喜欢的的一些抖音、哔哩哔哩上的小视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看过之后，我竟然喜欢上几个，有的内容特别简单，就是记录生活的一些常态，但我看得津津有味，还加了关注。我开始反思文学创作，为啥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为啥我们自认为深刻复杂的小说打动不了读者，而那些简单质朴的视频却让人欲罢不能？这不是简单的传播问题，和生产的内容有关系。

女儿看的这些视频其实和武乡县做微商的农民有异曲同工之处。

女儿还向我推荐她喜欢的歌，我竟然一首也没听过，连那些据说很红的歌星也不知道。我自认为是读书人，比较关注时代，对时代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写小说的过程中，不断审视，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落伍”了。

我告诉自己，要睁开眼睛，不能满足于以前已有的那些知识，也不能故步自封，只是片面地有选择性地接受自己喜欢的内容。世间开始慢慢变得宽广、丰富、复杂、多姿。而继续审视自己，发现真正的“隐疾”，存在自己身上，便把反思也写进了小说中，后来又写了《隐疾》这部小说，着眼于人怎样寻找更加理想的生活。《英雄李育民》《北京刮大风》《入海口》《流年》一样，都是重新打量这个世界之后，发现的新东西。这些小说写作时间不一致，但作品中相关的“人”都是和“我”息息相关的，他们是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些人，但因为普通而众多，因为众多而具有代表性。以上提到的6篇小说均收入小说集《隐疾》（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中指出，所有的现代主义者都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作品中带有异端的诱惑，二是对原则性的自我审查。从这两点来看，《隐疾》颇具现代性。



《隐疾》书影

《隐疾》作者杨遥，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地》《所有人的春天》，出版《二弟的碉堡》《流年》《柔软的光》《闪亮的铁轨》等多部小说集。曾获“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学”《黄河》《十月》《上海文学》《小说选刊》等优秀作品奖，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选刊，有小说译介到国外。

# 乡村呈现因时而变

## ——以《父亲和我的时代》为例

喻向午

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互为镜像关系，这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更能直观地体现出来。如何表现乡村？农村题材小说的出路在哪里？对很多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如果还致力于表现近乎原始的、封闭的、落后的乡村镜像，将会使作品严重失真，也无法准确呈现当下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态。不能印证现实生活，又如何保证作品情感的真诚和作家的真诚？作家和作品又将如何得到读者的信任？炊烟袅袅，鸡犬相闻，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乌托邦”想象同样令人生疑，这是一种没有现实生活基础、靠想象支撑的写作方式，这种想象全面脱离了当下农村社会的真实状况。面对现实，写作者倘若还闭着眼睛，以期掩盖传统的历史性延续，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缺席。没有乡村生活经验，没有对农民和乡土的关注，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自然无法呈现一幅全新的与现实生活同步的农村社会图景。学者吴晓东批评这种向后追溯反映的恰恰是自我创造力和更新力的薄弱，也是社会观察能力的枯竭。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紧跟时代、贴近农村现实生活、具有当下性和艺术性的小说作品层出不穷，成果可观。杨遥的《父亲和我的时代》（收入小说集《隐疾》），聚焦精准扶贫，让读者看到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位农民父亲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对于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面目，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在读者面前，镜眼中的乡村社会更加丰富多彩了，作家视角更加多样化了，文本形式也更能体现当下读者的审美需求了。

我们不妨以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为例，看农村题材小说的新变。这些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如何书写农村新面貌？又如何进入当下农民的内心世界？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经验，以及传统的乡土小说的表现形式是否继续有效？读《父亲和我的时代》，也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可以以《父亲和我的时代》看作一部家庭伦理和乡村社会伦理题材的小说。作品并没有直接提到国家的扶贫政策，也没有塑造一名扶贫干部，甚至连相关细节都很少出现，作品写的是“父亲”这几年天翻地覆的改变。“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变得沉默和不修

边幅。从“父亲”找我要一部旧的智能手机开始，他慢慢发生了变化。他加了“我”的微信，随后又让我在朋友圈转发他种植绿色食品的视频。更让“我”惊讶的是，“父亲”居然做起了微商，“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都是我们的平台”。为了让“父亲”高兴，“我”也成了他的义务推销员，在“我”并没有上心的情况下，“父亲”居然做得有声有色。“我”是一个大学毕业在城里做干部、当作家的知识分子，此时的“我”开始害怕自己变成了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他们，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父亲这一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契机，没有一个惊人的推动力在他身上施加影响，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杨遥用只言片语，巧妙地交代了作品的时代背景。这些不经意的碎片化的语言包括“碰上精准扶贫”“村里第一书记组织培训”“刚开始做微商时老师就教我们在各种平台上宣传自己”。为数不多的几句话，让父亲的变化变得合情合理、水到渠成。我们从小说的标题也可以获得作者的“暗示”。精准扶贫是因，父亲戏剧性的变化是精准扶贫的果。因此，《父亲和我的时代》也是一部精准扶贫题材的小说。

今后的文学创作，即便是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或者影响历史进程的农村政策的出台，相关题材的小说，作家的视点下沉，打破宏大叙事模式，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将会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作家的想象力、小说的叙事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态局面，乡村日常生活、社会风俗习惯、人伦关系诸如此类的叙事不断进入读者视野，作家也因此避免了诠释政策观念的“图解式”路子。比如《父亲和我的时代》，作品的表现方式别具一格，这对今后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多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曾说：“在将来，只有那些能够描绘出自己时代、自己的同时代人及其观点的最美好图景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他的这一断言今天仍被很多写作者奉为圭臬。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形式还是内容，农村题材小说的呈现方式，也应该因时而变。不把握时代脉搏，作品也就没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失去了这个根基，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将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

# 力促生态文学繁荣发展

## 省生态环境厅与省作协加强合作

近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共同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推进生态文学创作、研讨、交流、培训、推广等相关工作，促进新时代山西生态文学繁荣发展，更好地将生态文学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大局，描绘山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信心、铿锵步伐和显著成效。

新时代山西生态文学繁荣发展包括十项主要内容。

一是建立生态文学协调机制。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协商建立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负责山西生态文学工作的统筹谋划和组织协调。

二是支持生态文学创作。积极组织参与“大地文心”系列品牌活动，持续开展“美丽中国·生态山西”生态文学采风活动，继续组织出版生态文学作品集、主题丛书等。各市生态环境部门和山西省作家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结合本地（行业）特色，为作家开展生态文学创作提供必要条件，邀请作家走进一线了解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编辑、出版生态文学优秀作品。

三是强化生态文学理论研究。依托高校、研究机构等，推动建立生态文学研究平台，组织举办生态文学讲座、研讨、座谈等活动，邀请作家及社会各界代表分享生态文学研究成果，总结生态文学发展规律和路径，引导生态文学创作实践。注重加强生态文学评论，从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促进生态文学健康发展。

四是探索建立生态文学创作基地。依托国家级、省级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地区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借鉴山西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优秀经验，在全省范围建立一批生态文学创作基地，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和运行方案，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是丰富生态文学作品形式。积极将生态文学创作理念外延至不同文学领域，创作更多生态报告文学、网络生态文学、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生态诗歌、生态剧本、生态童话等作品，扩大生态文学受众面，培养更广泛的生态文学爱好者。

六是拓展生态文学传播途径。与报纸、期刊、出版社、网络媒体等加强合作，支持开设生态文学专栏、专辑，鼓励推出优秀网络生态文学原创作品，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广泛传播。

七是举办生态文学展示交流活动。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继续办好山西省“绿色读书月”活动，邀请生态作家与读者交流分享创作心得，鼓励各市生态环境部门和山西省作家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在“六五环境日”“世界地球日”“全国生态日”等时间节点举办生态文学作品展示、展览，组织交流活动。支持各级各类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场所设立生态文学专区。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积极争取承办全国性生态文学活动。

八是加强生态文学创作队伍建设。广泛组织动员省内外作家走进山西生态文明建设现场，积极投身生态文学创作，加强对生态环境系统生态文学创作人才的发掘、培养，鼓励基层生态环境保护者讲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鼓励和引导本土作家积极投身生态文学创作，壮大民间生态文学创作力量。支持青少年开展生态文学创作，扩大生态文学创作新生力量，进一步激发创作活力。

九是完善生态文学激励机制。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适时向社会征集和推介优秀生态文学作品，支持参与国家级、省级文学奖评选。适时推出创作规划、扶持计划，鼓励设立重大题材、重点领域生态文学创作项目。

十是促进生态文学作品创造性转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支持生态文学创作向多种艺术形式转化，联合文化单位、影视机构、网络平台等，推出有声读物、舞台艺术、动漫、影视等衍生产品，提高生态文学发展的创新性，扩大生态文学作品影响力。

肖静娴

我们身处一个文体变革的时代，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已经在彼此兼收并蓄和取长补短，报告文学如何能独居一旁？是否可以运用散文笔法描写环境、叙述事由和烘托氛围？又是否可以用小说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法，避免把人物神化成一尊完美无瑕的铜像，扁平化到让读者感到虚假不真实？或许还可以借鉴流行文学的长处讲好故事，让作品呈现出流畅的阅读愉悦。从来没有谁定义过，借鉴了其他文学体裁的写法，就不像报告文学了。——沉洲

一首诗是一个身体，一个用语言做成的身体。这个身体如果是活的，一定有一颗心；心在于身体，必须是活的。身体有高低胖瘦，形貌各异，但心却是无形的，是不可定义之物，它有赖于血液、气息、呼吸……心不是物，但心能转物。由于心是灵的，所以诗就得了灵魂。说到魂，身心是一体，不能硬分，硬分出来的身不再是身，硬分出来的心也不再是心。身心一旦分离，双方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身心可以分开而论，但不能对立起来。——树才

## 作家谈艺

温馨提示：“文学照进创想·新时代文学晋旅系列读书活动”第二期，将于12月15日（周五）下午3时至5时在小店区创新街山西智创城2号B座1层路过书店举行，山西青年作家手指分享小说集《小县城》。